

The Futures Market: Global Econom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Sites of Resista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One World: Globality and Totality
Cultural Studies and Civil Society
Culture and Ideology
in the Contemporary Arab World
Generalized Ethnography

全球化症候

先锋译丛 6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先锋译丛 6

全球化症候

主 编 王逢振

副主编 史 建

汪民安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F1506 16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症候/王逢振等编译.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1

(先锋译丛: 6)

ISBN 7-80563-859-4

I. 全… II. 王… III. ①经济一体化-研究-世界-文集②文化一体化-研究-世界-文集
N. ①F114.41②G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7687 号

书 名: 全球化症候
责任编辑: 史 建
装帧设计: 张 伟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 版 人: 荣长海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办公室)
(022) 23003323 (发行科)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38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14.00 元

前 言

“先锋译丛”已出版两辑。令人欣喜的是，仍然得到读者的厚爱和鼓励。有人称我们做的是“时尚理论”，此说倒也符合实际。毕竟，时尚与先锋或前卫的意思有些交迭。然而，应该说明，我们并不是一味地追逐时髦。我们在第一辑的前言中就曾说过，新的并不一定就是好的。但是，既新又有价值的东西，无疑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介绍新的、好的、有价值的东西，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先锋译丛”要坚持的方向。

这辑我们又推出两本新的译作：《全球化症候》和《性别政治》。为什么选择这两方面的文章呢？

大家知道，全球化是人们今天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但讨论最多的是经济全球化或经济一体化，对它与文化的关系则谈的较少，而且一般很少采取批判的态度。然而，正如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所说：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文化实践也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它们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说全球化是现代文化经验的惟一决定因素，也不是说文化是惟一解开全球化力量的

理性钥匙。换句话说，全球化的政治和经济不会屈从于先在的文化观念，或者先有文化的解释再有全球化。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若要真正理解全球化的巨大转变力量，就必须首先以理性的文化词语来描述和说明全球化的进程。同样，全球化的转变过程也会改变文化本身，改变我们自己的文化观念——在现代世界上，究竟什么是文化？应该说，不论文化还是全球化，都是最具普遍性的概念，都在争夺它们的意义。《全球化症候》不是对它们的详细分析，而是旨在抓住全球化在文化记录中的主要因素及其表现形式，从文化方面（包括政治和经济）理解全球化的概念，说明全球化和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换种方式说，它试图表明当前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相互关系，说明在文化和政治经济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这种逻辑与通常工具论或目的论的理性无关，而是依赖于历史进程以及这种进程在人们思想里的解释和反映。

《性别政治》收入了当前最重要的几位批评家的文章。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发展，一些极端的女性主义者受到质疑，女性主义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本书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参与了这场争论，涉及到政治地位问题，涉及到女性主义内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也涉及到话语权力和政治；尤其针对后结构主义会削弱女性主义的论点，本书的文章从理论上对政治的阐述进一步丰富了这场争论的政治意义。

在女性主义内部，曾经有这样一种信念：如果没有一种以本体论为基础的女性主体，就不可能有任何政治。这里，政治被理解作为一种再现的话语，它假定存在一种固定的、一般通过“妇女”范畴构成的主体。于是，对这个范畴的政治构成进行分析便被简单地排除在外。但是，这种排除的政治后果如何？或者说，对身份范畴的批判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对分裂的或多样的女性主义“主体”如何从理论上阐述？这种同质的边缘化的话语运作会形成什么样的批评潜力？《性别政治》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传统的基础受到怀疑时，女性主义批评如何发展？女性主义如果质疑主体的概念，会不会使它失去政治效果？什么样的主体应该质疑？这种质疑如何重构主体的能动力量，如何重构权力和政治抵抗的场所？女性主义对差异的重构会产生什么后果？对于种族和阶级差异的理论阐述，后结构主义对二元对立逻辑的批判有什么作用和局限？《性别政治》对这些问题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使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女性主义的某些最新发展，以社会文本（包括政治、经济、法律）为分析对象，而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文学作品。

《性别政治》中的论述同样是一种文化，尽管看似与《全球化症候》互不相关，但它们仍然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毕竟，性别政治不能脱离全球化这个大的语境。这也是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同时推出的原因。相信读者读

过之后，会得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最后我仍想就“先锋译丛”的翻译啰唆几句。大凡做过理论翻译的人，一定会理解这种翻译的难度。翻译经典理论需要广博的知识，常常为了一个概念或术语要去查阅相关的资料；而翻译新的理论除常见的困难外，更主要的是缺乏相关的资料，遇到难题查都无处去查，但又不能绕过不译，因此，译文难免出现个别陌生的术语。记得80年代初，当“Deconstruction”刚传到国内时，杨周翰先生译作“拆散主义”，钱锺书先生译作“拆散结构主义”，本人曾译作“分解主义”，直到后来才统译为“解构主义”。以此为例，并非想为翻译中的疏误开脱，而是期望读者更多地参与，匡正译文中的不妥之处。

王逢振

2000年岁末

目 录

前 言

王逢振 1

全球经济中的抵制场

三好将夫 1

期货市场:全球经济与文化研究

理查德·迪恩斯特 30

一个世界:全球性与总体性

保罗·史密斯 67

文化研究与公民社会

乔治·于蒂斯 154

当代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与意识形态

沙米尔·阿明 184

普遍化族裔研究

让·巴詹 212

全球经济中的抵制场

三好将夫

王晓群 译 陈永国 校

耐克承包商曾在韩国生产鞋，但由于工资上涨而转移到印度尼西亚。在印尼他们付给从早干到晚的年轻缝鞋女工每天 1.35 美元。她们没有工会保护，并经常被强行加班加点。生产成本仅为 5.6 美元的一双耐克鞋在美国卖 45 到 80 美元。据报道，迈克尔·乔丹促销这个品牌的费用是 2,000 万美元，比 1992 年 6 家耐克工厂的全部工资总额还要高。现在又传说耐克可能要再次搬迁，这次是到越南。在这个共产党国家里，劳工稳定可靠，而更重要的是，费用还要低得多。

.....

现在“全球”经济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事。跨国公司和跨国经营是要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这种为追逐最高利润而在全球范围内再次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案，将重构我们多少世纪以来所熟悉的社会与文化。

首先，我将简要地提出有关跨国公司组合性的几个要点，然后推测出可能对全球势力构成阻碍的几个场所，最后考察位于全球公司系统内部的大学的作用。

1. “全球”经济

自资本主义兴起以来，工作和生活就一直在普遍地重组。然而早期的工业革命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而在关键的开始阶段仍然是区域性的。技术与工业和劳动力与资源的分布不均，以及由此造成的财富和繁荣的分布不均，自然导致了西方内部的剥削模式。但是西方同非西方两者之间的鸿沟所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因此，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明确要求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对世界资源的要求和支配权。在上个世纪之交，世界85%的地区都被认为是不发达地区。我们对这段历史都十分熟悉。

工业的跨国化是在战后自动化、合成化学、电子，以及计算机化信息、通讯和制造业高科技领域中革命的产物。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全球范围内的联系变得史无前例的便捷，时空的缩小现已成为无可争议的现实。¹只

要目标区域能保证如下条件，资本便可在时空上自由流动：（1）稳定的政治结构，（2）切实可行的劳动力状况（即可廉价培训的或有可供培训的劳动力，加上没有工会主义、女权主义和人权的约束），（3）适当的基础设施，（4）较低的税率（接受政府的优惠待遇），（5）对环境的熟视无睹。现在，在这个技术扭曲的空间里，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是流动的私人公司，而不是在地理上根深蒂固的民族-国家。²

现代西方国家中国家和贸易公司间的关系从未得到清晰的描述。虽然经过18和19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君主与国家融为一体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变，但在大多数殖民帝国的事业上，国家机器和正在出现的商业利益却深深地搅在了一起。劳工斗争，特别是在早期，是要流血牺牲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斗争，今天的工人就不会享有现在的利益。然而，福利国家的思想在当时只是虚幻而非现实。二战后的遏制政策不仅仅是针对第二和第三世界的，而且还针对第一世界的大多数人。因此美国内部的财富分配一直头重脚轻。1950年，占总人口20%的最富有人口获得的家庭收入是总收入的42.8%，而占20%的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则仅占4.5%。1989年，这个数字分别为46.5%和3.8%。70年代初，占1%的最上层人口拥有国家所有财富的17.6%，而到80年代末，它却拥有36.3%。³毫无疑问，这是两个世界的故事。尽管如此，在早期作为或多或少的统一体，民

族-国家的观念还有些合法性。60年代以前，人们还是把贸易公司界定为国境内受政府控制的机构，它们在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里至少有时还要对坦率直言的人民的意愿负责。60年代及其后跨国公司的发展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跨国公司极为自治，而且随着自身的逐渐壮大，它们越来越躲避政府的控制，离开民族-国家，利用国家机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并抛弃民族（即公民和公共空间的集合）而自行其事。

另一方面，“自由贸易”究竟有多少自由？人们以为保护主义只是意味着国家在各个贸易部门中的干预，支持某些产业而反对另一些产业，扶持生产者而反对消费者，等等。从亚当·斯密的时代起，自由贸易思想就一直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然而，美国贸易的实际历史直到近年来都一直是公开的“保护主义”。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上，关税很少低于30%，甚至在关贸总协定建立之后，它们仍保持在15%或更高些。事实上，只在不久前，1979年美国的平均关税才降到今天的5%。人们只需回想一下，1970年前，美国的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比率还相当低。而只在70年代，贸易总流动就从大约8%到10%增长到20%到25%。然而，到70年代中期美国才首次成为贸易国家。这时跨国公司的活动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就是说，源于美国的以及海外的合资公司开始将它们制造的商品运回美国。而且恰恰在那个有利的时刻，普遍税率降低了。然而，即使在那时，美

国也没有放弃保护主义，只不过是转到非关税的壁垒上，如“自愿出口限制”。而且通过这种目标狭隘的保护主义手段，市场的扭曲一直持续到今天。有趣的是，随着跨国公司逐渐将资本、劳动力和工厂转移到别处，从70年代开始，美国工人的周平均收入就稳步下降。

70年代，来自欧洲和日本经济的挑战日益加剧。由于越南战争的巨大浪费和冷战时期的其他承诺，以及自1945年以来就妨碍工业创新的政治上和工业上的夜郎自大，都使美国的生产系统停滞不前。卡特总统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失败后，里根和布什总统实施了彻底的经济改革，大规模地将财富从穷人转向富人。1944到1945年间（虽然是战争年代），联邦政府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等级为94%，1954到1963年间仍高达91%，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在80年代里根-撒切尔推行的激进的精英统治时期，最高所得税率从70%减少到28%。以提高生产率和效率的名义，大部分公共服务业都再次被视为浪费。因此，联邦公共事业、教育和福利的预算只要与国家“安全”无关就经常受到质问。公共项目和机构的私有化是当时人们的呼声，而利润和自我利益是当时惟一“合乎情理”的动机。按照这种给予个人激励以特殊地位的基调，跨国公司对它们的结构调整不表示任何歉意。公司扩大了工资等级，允许高层的首席执行经理们获得惊人的高薪，而使广大工人维持最低的工资水平。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位公共设施经理身兼双职，其工薪高

达3,000万美元,而这家报纸通常对如此的高工薪并不感到怎么惊讶。但是这个例子与收入3,400万美元的“海市蜃楼休闲胜地”总裁相比,或与虽然基本工资加奖金仅为700万美元,但却从股票期权中获利2亿美元的沃尔特·迪斯尼乐园董事长麦克·艾斯纳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⁴中产阶级的缩小不可避免。在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中,产业的重新安置差不多在各地都得到了认同。⁵今天,许多雇主正在放弃传统的雇员利益(健康和退休保障),而国家项目,诸如普遍的医疗方案和社会保障系统,并未获得广泛的支持。冷战的结束加快了这一趋势的步伐,而“和平红利”或将国家的目标从国家安全转向福利的允诺却没有兑现。

在克林顿政府的领导下,经济形势基本上未有多大改变。正如富人变得越来越富一样,大公司变得越来越大。根据《外交界》发表的文章,最大的十家跨国公司1993年赢利348亿美元,仅比较次之的190家跨国公司的全部利润386亿美元略少些。这2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1992年销售总额为5.9万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值的26.8%。财富的这种集中是由资本、劳动力和市场的跨国化实现的。工业化国家工作岗位的消失远比失业统计数字严重得多。据一项研究表明,“1992年失去工作的4人中有3人未回到同种岗位上来”。那些找到工作的人通常也是未按专长雇用(资历过高)或就业不足(零工、无福利待遇)。此外,临时工(也被称作“应急”工人)现

在正日益成为企业用人的主力军。仅在 1993 年下半年，临时解雇 1 万以上职员的公司名单就有一长串：其中，施乐（1 万人）、菲利普·莫里斯（1.4 万人）、普罗克特与甘布尔（1.3 万人）、伍尔沃思（1.3 万人）、马丁·玛丽埃塔（1.1 万人）、IBM（6 万人）、南方电话公司（1 万人）。甚至兵器工业也从 1987 年的 366 万最高就业人数减为 1993 年的 273 万人，据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另外 70 万个就业岗位也将消失。

减少就业人数不仅仅是一个美国现象。位居世界前 500 名的大公司，尽管它们的利润在上升，但每年都临时解雇 40 万工人。失业、降低工资、减少公共服务部门和激进的精英管理思想的传播在整个跨国化的世界里相当普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1994 年 2 月 2 日的报告，占整个世界劳动力 30% 的 8.2 亿工人失业，或所得报酬低于最低工资。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就业状况最差，但在拉丁美洲、古老的第二世界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的劳工危机亦迫在眉睫。1994 年 3 月 14 至 15 日，克林顿总统与 7 国经济部长在底特律举行了工业化国家就业危机的国际会议。该会议把可能比最富有的 7 国更需要紧急措施的所有贫穷国家都排除在外了。

完全工业化的地区和仍在发展中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距。首先，全球化对北方和南方的影响并不一样。例如，尽管提出了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辩护的某些论点，但墨西哥的工资非但没有立刻提高，反而不真实。

事实上，由于工业转移的直接原因是廉价劳动力，所以跨国公司和东道主政府都不可能自愿放弃它们自己讨价还价的立场。在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前，美国联合会及工业组织大会担心它可能对美国工人产生影响，而且忘记了美国和墨西哥经济规模之间的巨大差异（1992年的6万亿美元对2,900亿美元）。虽然这对北美工人的影响将是严重的，但是，与对以小作坊形式生产的墨西哥工人的毁灭性影响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而人均收入3,200美元的墨西哥已是世界上较富裕的国家之一了。

第二，跨国公司经营所要求的政治稳定有效地压制了民主要求。因此，在东北亚地区，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新兴经济中“紧缩”的预算和对人权的剥夺多年来一直是残酷的，只是在近几年台湾和韩国才解除了紧急状态。

第三，恰帕斯暴动是一个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毁坏自然环境的一个好例子。墨西哥伐木行业多年来不加区别地采伐热带森林，为牧场清地和出口硬木材。其结果既毁坏了玛雅印第安人的居留地，又毁坏了大片森林。印第安人被赶出森林后，向北迁徙到美国边境，在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小作坊里寻找就业机会。生态环境毁坏的最终影响要在几代人之后才能见分晓。这种毁林、沙化和迁徙的例子在巴西、刚果、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西非和其他地方都可见到。酸雨、空气污染、

食品和水污染、海洋退化、温室效应、臭氧层减少、垃圾堆积等同类星球生态系统的破坏都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但时至今日仍没有具有执法权力的管理机构对跨国公司极端恶劣的行为加以管制。

第四，人类居留地的极端变化意味着对地方和区域文化的摧毁。此外，最大利润原则将毫不犹豫地毁灭当地人的社会日常生活，他们不愿将自己转为诱人的商品。甚至官方的“传统”艺术品——音乐、诗歌和艺术，都要受到是否有销售价值的检验，而且，所有民间仪式上的产品和演出也要受到同样的审查。“传统的”艺术形式被搞得支离破碎，为了展览、收藏或销售而将它们与相关背景分离开来。甚至地方抵制和排外主义者的不满也挡不住消费主义的诱惑。这种情况人们可以在粗糙的雕刻艺术和打击乐的历史上见到。通过审美化和/或标价，人们赋予所有文化产品以新的意义。旅游和娱乐似乎是征服论者的最终归宿，而地方的、国家的和地区的差异在世界主题公园中总是处在被缩小为细微变异的边缘，这一点与跨国公司的世界观是息息相通的。

从根本上讲，民族文化的思想一直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个产业。作为民族-国家建设项目的一部分，大约在18世纪末和整个19世纪，一种“文化”就被选择、被编辑、被授予特权来代表各自的民族。跨国公司时代再次改变了这一思想，民族文化越来越不重要了。现在，多元文化作为可交换的商品占据了主导地位。好莱坞电影，